

· 文學研究 ·

增刪官方文學獎和調節非官方文學獎： 長普京時代俄國文壇變化*

林精華

[提 要] 長普京時代區別於葉利欽時代,在文壇上的反映包括:原來設立的官方文學獎或日益國家話語化,如俄聯邦國家獎變化為獎勵那些在直接服務於國家要恢復蘇俄空間的“俄羅斯世界”概念中做出特殊貢獻的文學藝術家,甚至文藝服務業人員,或取消試圖繼續倡導要融入西方的獎項,同時增加旨在直接彰顯“俄羅斯世界”概念之魅力的文學獎。與之對應的是,原來設立的民間文學獎紛紛夭折,無論是英國人設立的“布克獎”因不符合國家話語導向,還是國內財富精英設立的“反布克獎”,只有與國家話語所需吻合的才能生存,新設文學獎亦然。但這樣做又反噬文學獎自身,俄羅斯文學在後冷戰時代的世界影響力始終不彰,或與此不無關係。

[關鍵詞] 官方文學獎 民間文學獎 國家話語 長普京時代

[中圖分類號] I1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5) 04 - 0164 - 14

普京開啟第二個任期伊始(2004 年 6 月 21 日)便簽署兩項總統令,分別終止葉利欽簽署的旨在追求去蘇聯化的官方獎項,即獎勵詩歌領域獲最高成就詩人的“奧庫扎瓦國家獎”(1998)、獎勵極具才華詩人的“普希金國家獎”(1995),哪怕這兩個獎項影響力巨大。同在 2004 年,普京擴大國家獎在文學藝術領域名額,設立俄聯邦總統文學藝術獎。之所以如此大膽行政,是因他執政第一任期末期,葉利欽時代留下的許多棘手問題直觀上得以解決,他的聲望日隆。在這種情勢中,他很容易動員官方乃至社會力量介入文學藝術事業,如設立越來越多的官方獎,非官方獎增減也日益受國家意志影響,從而波及文壇發生結構性變化。這種情形隨著長普京時代的延伸,有增無減。

一、初步調整民間文學獎和國家文學獎:普京總統第一個任期文壇變化

普京為改變葉利欽時代狀況,加大實施國有化政策力度,如執政不久,便對在新聞播報、時事評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多卷本俄國文學通史”(項目號:17ZDA283)、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現代文學意義的生產與俄蘇文學關係研究”(項目號:22&ZD279)的階段性成果。

論和社會問題分析等欄目表達獨立聲音的“獨立台”進行國有化改組。此舉引發媒體人和作家貝科夫(Дмитрий Быков)反對普京壓縮自由表達思想空間,認為這涉嫌違反《大眾傳媒法》,還曾兩次拒絕普京約見。不過,因沒有書報刊審查制度羈絆,他仍如常刊行《帕斯捷爾納克傳》、《六月》、《拖車》等作品,並獲巨著獎、暢銷書獎、銅蝸牛獎。但這位聲望赫赫、思想深刻的文學家,卻再也未能獲官方文學獎,甚至不得不於 2021 年移民美國。

進入福布斯財富排行榜的後現代主義作家和日本文學翻譯家阿庫寧(Борис Акунин)、以《追悼蘇聯文學》(1990 年)和《俄羅斯美女》(1982)而著稱的文學家葉洛費耶夫(Виктор Ерофеев),因反對當局逮捕尤科斯公司總裁霍多爾科夫斯基和 МЕНАТЕПа 公司前總裁列別傑夫(Платон Лебедев)無果,便在媒體上宣稱,對這些財富精英的重判,是法律史上最可耻之頁。然而他們的抗議收效甚微,還禍及自身:雖然葉洛費耶夫獲法國和波蘭頒發的獎項、阿庫寧獲日本頒發的文學獎,但他們此後皆未獲俄國任何官方獎項。

普京執政伊始,便嚴厲打擊金融寡頭。從 2000 年 6 月開始,檢察院以涉嫌詐騙國家巨額財產罪,先後起訴和重判霍多爾科夫斯基、列別傑夫,以及古辛斯基、別列佐夫斯基等人,使關於市場化之神話消失,同時重塑克里姆林宮權威。這種用事後法律去追訴此前合法發達並積極投資於國家各項事業的經濟大亨的做法,卻因契合市場經濟傳統本就不發達且被中斷 70 餘年、大量普通人在轉型中所得極少之情勢,獲俄羅斯大眾支持。普京便順勢形成各領域的國進民退態勢,終結葉利欽時代中央和地方及各政黨之間的紛爭,以強力手段穩定盧布幣值。由此,普京連任總統順理成章。對此,西方許多媒體哀嘆道,俄國民眾對普京的廣泛擁戴,就像對前蘇聯領導人的個人崇拜那樣,只不過這次乃自發形成。^① 這種變化,應和馬卡寧(Владимир Маканин)《地下人,又名同時代人》(1998)呈現的人們不滿葉利欽時代改革的情勢,該作獲多種獎項,預示著國民希望重估蘇聯解體、重振國家、恢復社會秩序。

這種名義上用法律解決經濟危機、實則用政治手段解決所謂金融寡頭問題並收緊公共輿論的做法,顯然與蘇聯解體帶來的效益相違逆,卻得到民眾支持,因而文化精英和經濟精英的抗議收效甚微。如是氛圍,直接影響到當局對文學獎的結構進行調整。後來曾短暫出任俄聯邦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的巨富別列佐夫斯基(Борис Березовский),面對英國人把布克獎延伸到俄國並產生巨大影響力,便以其愛國之情和熱愛俄羅斯文學之心,出資支持《獨立報》創設“反布克獎”(Антибукер)。儘管該獎試圖抵消英國布克獎在俄國延伸的影響力,迎合了轉型中的俄羅斯國族主義訴求,但在普京總統執政第一年,這個有著巨大影響力的獎就夭折了。

自 1995 年首屆評獎以降,反布克獎就引發社會關注,不僅是因以比布克獎多 1 美元的高額獎金,更因評審結果的相對高質量,如首屆只授予瓦爾拉莫夫的《誕生》,詩歌、戲劇、文學批評和回憶錄空缺。第三屆(1997)獲獎作品包括加爾科夫斯基《無盡頭的死胡同》、基彼洛夫詩集《同義異說》、鮑嘉耶夫(Олег Богаев)的劇作《俄羅斯夢》,2000 年獲小說獎的是阿庫寧的《加冕禮,又名羅曼諾夫王朝末期》,它們自然顯露出對俄羅斯國家或文化的認同性焦慮。

2000 年 5 月 8 日,別列佐夫斯基還受邀出席普京就職總統典禮,月末就對普京修憲賦予克里姆林宮更大權力提出質疑。9 月,他拒絕克里姆林宮迫使他轉讓電視台 OPT 股份的要求,還在《華盛頓郵報》聲稱,若沒有強大的公民社會,俄國社會進程會倒退,於是便被作為金融寡頭遭到普京打壓,10 月甚至被檢察官傳喚。彼時他正在英國,高調宣稱被迫成為政治流亡者,不再回國。這些自然危及反布克獎——僅僅維持六年就告終。

終止“反布克獎”僅僅是長普京時代之開端。1991年7月23日，原本維護蘇聯的著名作家普羅哈諾夫(Александр Проханов)與邦達列夫等作家及蘇聯黨政軍界要人聯名發表《告人民書》(被視為“八一九事件”的“理論綱領”)，這也觸動他刊行小說《帝國的最後士兵》。作為俄羅斯民族主義《明日》報主編，面對時局巨變，他修訂《帝國的最後士兵》(2003年)，以政治分析家和克格勃將軍別洛謝利采夫的視角敘述“八一九事件”，表達對蘇聯的忠誠，同情俄共，批評葉利欽及其追隨者。如此敘述引發截然不同的評價，面對普京權力來源於葉利欽並藉助執政資源而輕鬆勝選，執政伊始加大限制俄共活動、終止討論國家話語，普羅哈諾夫思考俄國未來，繼而創作《黑炸藥先生》、《政治學家》、《第五帝國》等。在結構上與《帝國的最後士兵》相類似的《黑炸藥先生》(2001)，把世紀末俄國發生的克里姆林宮權力交接等敘述為黑箱政治，巧妙地揭示金融寡頭、克里姆林宮政治權謀之真相。這些敘述極為大膽卻不合時宜之作的問世，引發社會紛爭，讓作者毀譽參半。這是因為普京調整國家權力結構，影響到了包括文學作者和讀者在內的居民生存狀態和理想。

長普京時代到來不久，文壇發生巨變，更因普京上任之初便改變了葉利欽時代的基本政治架構。地方長官普選制本是蘇聯解體的積極成果之一，俄聯邦進程中最初十年一直堅持這一制度，使轉型時期政治生活充滿活力，但也限制了中央政府在社會治理和發展中的權力，刺激了地方分離主義。2000年5月，普京剛出任總統不久，就推動杜馬通過《聯邦委員會(議院上院)組成辦法草案》、《聯邦地方自治設置原則修正案》等法案。由此總統有權罷免地方州長、有權建議國家杜馬撤銷地方法律法規，甚至有權建議解散地方立法機構，並把全俄85個聯邦主體劃分為7個聯邦區(2014年增加到8個)，在每個區派駐監督各州長的總統代表等。這種促成權力、資源、財政等不斷回歸中央的改革，招致地方反對。普京利用2004年9月北奧賽梯別斯蘭中學劫持人質事件，順勢取消地方行政領導普選制，終止了1992年總統、政府和地方領導人簽署的《聯邦條約》，合法地削弱了地方行政長官權力，遏制了地方分離主義態勢，也鞏固了親普京的“統一俄國黨”在全俄各地的影響力。與此同時，普京還大幅改革杜馬：地方行政長官需進入隸屬於總統直接領導的國務委員會，從而限制地方對中央決策的影響力，加大克里姆林宮對地方的掌控，還影響杜馬選舉結果，確保“統一俄國黨”獨大並變成政權黨，成為中央選舉的最重要資源。這些在實質上違逆蘇聯解體初衷的舉措，導致克里姆林宮重新壟斷行政權力和財權，蘇聯時代的國家強盛、社會發展和居民所得不同步的機制復活，這種政治生態衍生出中央和地方在許多領域相互扭曲的結構，降低法律嚴肅性、公權力的社會道德倫理召喚力，使機會主義和功利主義開始彌漫。^②

這樣的情勢推動長普京時代到來，如選民要求普京連任的呼聲很高，他以空前的高支持率(高達71.31%)獲第一次連任，也很快改變了俄的社會氛圍。在伊拉克戰爭之後，美國進入高加索和中亞地區，俄國戰略空間進一步收縮，但這些反過來推動普京重建俄國和西方關係，借機建構反西方的國家話語，進而推動重建大國地位的战略，把持續十餘年的去蘇聯化浪潮轉換為對蘇聯的懷舊。蘇聯—俄聯邦時代著名媒體人和作家帕爾菲諾夫(Леонид Парфёнов)先後在中央一台、獨立台製作新聞時評——歷史節目《不久前》，展示對所經歷的蘇聯之認知、情感的如是變化。這種懷舊性氛圍很快演變為社會潮流，莫斯科等城市重建價值不菲的仿斯大林風格公寓，售房廣告也有“斯大林風”，並孕育出要恢復蘇俄空間的“俄羅斯世界”概念。

如此一系列政治改革及其所營造的社會氛圍，使媒體、文學藝術、人文社科等領域深切感受到，蘇聯解體後的政治生態環境在急劇變化，使文學家境遇、文壇結構也發生相應的變化。普羅哈諾夫訴說轉型失敗的《黑炸藥先生》和《帝國的最後士兵》，問世過程困難重重，連政治傾向和作者一致

的保守派雜誌《我們同時代人》也拒絕接納該書稿，他不得已在自己主編的《明日報》以及同道的《蘇維埃俄國》報連載。所幸，因其中的時政性描述和犀利評論，Ad Marginem 出版社看好其市場前景，便大膽出版單行本，引發社會關注。著名政客涅姆佐夫（Борис Немцов）痛恨其中所描繪的金融寡頭情節與形象，聲言該作根本不是文學、藝術，而是一些瘋狂的虛構，對許多場景和人物的敘述很不道德。俄共主席久加諾夫則相反，認為該作揭示了俄國所發生的悲劇之本質，任何認真思考國家命運的人皆該讀該作。^③這部備受爭議的小說獲暢銷書獎（2002），作者把獎金捐給政治同道和政客型作家利蒙諾夫（Эдурд Лимонов）。

詭異的是，普羅哈諾夫在蘇聯末期任有自由派色彩的《文學報》記者，觀點和言論常以激進著稱，卻在蘇聯解體前後，突然轉型為眷戀蘇聯的政論家，公開反對葉利欽時代金融寡頭政治，把葉利欽和普京之間的國家權力交接視為“私相授受”，對普京的改革、塑造政治強人形象等不以為然。但他渴望恢復強大俄國的敘事契合長普京時代的國家話語，如《俄羅斯勝利步伐》（2012）採用新聞性敘述方法，展示對俄國過去和未來的思考，積極敘述俄羅斯文明在經歷一次次悲催後又一度復活，深得官方讚許。2012年7月普京簽署《關於批准公共電視委員會組成》令後，他當選委員，還任國防部公共委員會副主席。

在這樣的政治進程中，國家獎的結構和導向自然發生變化。蘇聯解體伊始，蘇聯國家獎轉型為俄聯邦國家獎，拉斯普京獲獎（2000）是因其作品深刻表達國民在蘇聯—俄聯邦時代的人生悲劇，把斯拉夫民族傳統的價值觀之審美表達與對俄國大自然之神奇的描繪相結合，以彰顯俄羅斯精神之純潔和魅力。強烈批評蘇聯的俄僑作家沃伊諾維奇（Владимир Войнович），其著名小說《宏大宣傳》（2000）因加大否定性敘述蘇俄史的力度、契合時代所需而獲該獎，翌年他又獲薩哈洛夫獎。

與之相反，在葉利欽時代和當局關係緊張的索爾仁尼琴，激烈地批判蘇聯，並非是因崇尚西方，而是熾熱地認同俄羅斯作為斯拉夫主體民族，力主通過復興俄羅斯—斯拉夫民族一體化（主張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和哈薩克斯坦應統一成完整國家）而振興俄國。這與葉利欽治國理政主張南轅北轍，卻契合普京改革，獲莫斯科大學榮譽博士學位（2003）、“年度俄國精神領袖”獎（2004）。鑒於俄聯邦國家獎影響力日漸遞增，從2004年開始，普京擴大該獎數量，文學藝術領域和科技領域各擴大到3名，翌年增加1名人文學術領域成就獎。索爾仁尼琴從“俄羅斯世界”角度批判蘇聯，契合普京戰略轉型所需，獲國家獎（2007）。普京在頒獎禮上宣稱，全球成千上萬人把他的名字和創作與俄國命運聯繫在一起，其研究俄國的學術成果和創作的文學作品，事實上就是他的全部生命，他把一生獻給祖國，總統要代表全俄感謝他為俄國所做的貢獻。^④這樣的國家獎導向，不斷推高索爾仁尼琴這類契合“俄羅斯世界”概念作家的聲望：2008年8月3日他去世，克里姆林宮為其舉行國葬，時任總統梅德維傑夫和總理普京、原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科學院院長奧西波夫院士、莫大校長薩多夫尼奇院士、曾任政府總理的普里馬科夫院士等等政要和社會名流出席其隆重的彌撒葬禮，並於去世兩週年忌日，在莫斯科豎起索爾仁尼琴高大塑像。

隨著長普京時代的延伸，國家獎的現實性功能也更加強化。2008年文學藝術獎授予的不是作家，而是國家軍事—歷史和庫里科沃原野自然保護區主任格力欽科（Владимир Гриценко）、副主任納烏莫夫（Андрей Наумов）、資深研究員丹尼洛夫（Владимир Данилов），是因他們對快速重振俄聯邦的功用，更能立竿見影。這種不獎勵文學家的情形，在2008~2020年間成為常態。在普京治下，國族主義外交、實用主義內政之趨向顯而易見，導致語言書寫的審美產品在文化市場化語境中影響力下降，財政預算更願意支持在愛國話語建構上有直接效果的影視、音樂、戲劇、博物館、圖書

館等,由此 2011 年國家獎授予國家電影電視公司總經理和副總經理。

2009 年獎勵有蘇聯情懷的詩人葉甫圖申科(Евгений Евтушенко),2012、2013 年分別只獎勵拉斯普京、伊斯坎德爾(Фазиль Искандер)。這兩位有著強烈斯拉夫情懷的蘇聯時代名作家,雖然在 21 世紀鮮有重要作品問世,卻支持普京的治國方略。1976 年獲蘇聯國家獎的作家格拉寧(Даниил Гранин),在葉利欽時代去蘇聯化浪潮中積極批判蘇聯、呼吁融入西方,獲總統獎(1998)、國家獎(2001),隨著普京時代延伸,轉向俄羅斯國族主義,獲聯邦政府獎(2014)、國家獎(2016)。同樣,批評家巴辛斯基除《19 世紀末~20 世紀俄羅斯文學和第一代僑民》(2002)閃出智慧之外,絕大部分著述,無論是對高爾基還是對托爾斯泰的文學批評性研究,多是一般性闡述他們的俄羅斯認同,他由此成為聯邦政府機關報《俄國報》專業評論家,因《高爾基》(2011)、《寫實主義時代的人》(2012)等著述,獲國家獎(2018)、赫爾岑獎(2020)。

這種趨勢,隨著長普京時代延伸,波及影響力同樣巨大的“凱旋獎”。別列佐夫斯基以其強大的團隊,發表百餘篇學術論文和多部數學著作,當選科學院通訊院士(1991),他利用自己的聲望和市場經濟改革而暴富起來,創辦基金會,在莫斯科普希金造型藝術博物館設立非官方文學藝術獎“凱旋獎”(Триумф)。首屆授獎範圍覆蓋原蘇聯空間;第二屆(1993)獲獎者包括詩人阿赫馬杜琳娜、作家日瓦涅茨基;此後,許多著名文學家獲該獎,如阿斯塔菲耶夫(1994)、達維多夫(1995)、沃伊洛維奇(1996)、阿列克謝維奇(1997)、伊斯坎德爾(1998)、托爾斯泰雅(2001)、彼得魯舍夫斯卡婭(2002)、施瓦茨(2003)、楚洪采夫(2005)、別楚赫(2010)等,因為他們普遍熱心於展示蘇聯制度對普通人的傷害。官方以反腐敗名義,以事後法律追訴別列佐夫斯基,還通過國際刑警組織以欺詐、洗錢和企圖暴力奪取政權等罪名通緝他。如是一來,這個獎項的運行日益艱困,2010 年落幕。葉利欽時代體制內外的文學獎儘管宗旨不同、評獎程序有別,但皆推動文壇積極創造去蘇聯化的俄羅斯文學,隨著普京調整轉型戰略,文學獎的命運受到影響也就在所難免。

二、調整民間文學獎和國家文學獎範圍擴大:長普京時代之初文壇大面積變化

令人驚奇的是,長普京時代到來不久,俄國文壇出現一大批車臣戰爭題材的作品。如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邊疆區稅務警局警官米洛諾夫(Вячеслав Миронов)創作的《我曾親歷戰爭:1995 年車臣》(2001),真切敘述第一次車臣戰爭期間俄軍未擊敗車臣武裝分子的後果。時任《新報》評論家帕麗特科夫斯卡婭(Анна Палитковская)深入車臣所創作的《地獄之旅:車臣日記》(2000)、《第二個車臣女人》(2002)、《車臣:俄國之耻辱》(2003)等敘述車臣人的殘忍,表明發動第二次車臣戰爭的正當性。這些作品大多把這場摧毀格羅茲尼之戰描繪為反恐,敘述車臣武裝分子的暴虐和俄軍的浴血奮戰,翻轉 1990 年代車臣戰爭題材作品。1999 年下半年莫斯科出現多起暴恐事件,普京借機發動第二次車臣戰爭,用戰爭手段解決車臣地位問題,贏得社會聲望。基於此,文壇也在發生變化,從而出現上述作品,並激發更多促進認同國家的文學獎誕生,強化文學獎的愛國主義導向。

1990 年代,索爾仁尼琴和葉利欽關係緊張,但在法律保障下從事文學事業。他構想的“索爾仁尼琴文學獎”成功創設(1998),旨在彰顯俄羅斯文化傳統,由作家太太任評委會主席,批評家巴辛斯基等任評委。托波洛夫(Владимир Топоров)院士因對俄羅斯精神文化和世界文學的探討而成為首位獲獎者,彰顯俄羅斯傳統文化價值的老作家拉斯普京獲第二屆獎(2000),莫大哲學系教師謝達科娃(Ольга Седикова)和歸僑詩人庫巴蘭諾夫斯基(Юрий Кублановский)獲獎(2003),則因用簡潔抒情語言來表達生命之神秘、用豐富修辭和豐饒的形而上學訴說俄羅斯命運。然而,長普京

時代延伸不斷招致文壇分裂,如《新世界》評論部主任羅德良斯卡婭(Ирина Роднянская)在《現實生活就像襯衫》(2005年)中稱“好的文學對我們來說仍是一個重要的生活來源,儘管並非更直接的來源”,表達對文學的信心,但在《病理學中的俄國》(2010)中則論述俄國猶疑全球化之不合時宜性。提出1990年代文學批評堪稱“輝煌十年”的批評家涅姆澤爾(Андрей Немзер),原本積極推動國家開放,但隨著長普京時代延伸,轉向探討一般性文化問題。在烏克蘭戰爭持續近三年之際,他獲得索爾仁尼琴獎,表彰“他誠心誠意地服務於俄羅斯文學,熱情地捍衛其道德和審美基礎,在科學、文學批評和教學等方面的高度專業精神”。

在這種氛圍中,2011年俄羅斯正教會按宗主教基里爾的倡議,設立名義上的“聖徒基里爾和梅福吉宗主教文學獎”,實際上是准官方獎。教會在長普京時代,全方位支持克里姆林宮政策,例如,在克里米亞入俄過程中教會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此,克里米亞入俄雖引發社會撕裂,但該獎仍授予庫爾巴托夫(Валентин Курбатов)這位在俄聯邦時代刊行16部文學評論著作的評論家。在對蘇聯懷舊的社會氛圍中,這種蘇聯時代的普通作家,反而時來運轉,出版《我們神聖的祖國》(2007)、《我們的責任》(2007)、《日常的普希金》(2014)等契合時代主流話語之作,按主流話語分析帝俄—蘇俄時代經典給俄聯邦時代帶來的文化負重,贏得國家獎(2020)。相應的,蘇聯著名的軍旅作家邦達列夫(2016)、蘇聯功勳文化工作者波塔寧(Виктор Потанин)、《莫斯科》主編阿爾焦莫夫(Владислав Артёмов)等在葉利欽時代被淘汰的作家,也因為充滿著蘇聯情懷,先後獲獎。

所幸,長普京時代延伸,伴隨著國家話語日益強大,卻未改變法律保障言論自由,文學仍可通過文化市場而非意識形態尋求存在和發展空間。在這種張力中,曾獲國家獎(1999)的作家馬卡寧,創作了不同於主流車臣戰爭題材敘事的小說《阿山》(2008)。他本來對第一次車臣戰爭就持懷疑態度,寫下消解愛國主義傳統的小說《高加索的俘虜》,成為對這場戰爭進行後殖民批評敘述的極少數作家之一。在第二次車臣戰爭發生後,他又轉向車臣題材寫作,刊行再度質疑這場戰爭意義的長篇小說,即少校軍官日林自敘所經歷的車臣戰爭、俄軍腐敗之慘狀,寫作技術上該作勝過《高加索俘虜》,獲當年巨著獎。《阿山》主人公和《地下人,又名同時代人》主人公一樣都是“我們時代人物”,後者作為作家沒有發表過作品,前者作為軍人只是軍需官,而非出入戰場的軍官。^⑤這部提醒俄國人不要簡單化地把車臣人訴求視為恐怖主義的作品,雖然廣受歡迎,翌年卻被反全俄暢銷書獎機構評為最差的暢銷書(НайWorst)。這位獲第二屆布克獎(1993)和第八屆國家獎的作家,因創作傾向不合主流,此後除獲歐洲文學獎(2009)外,再沒獲其他文學獎。

更有甚者,幻想類作家盧基揚年科(Сергей Лукьяненко)的《守夜人》系列(1998),敘述現代莫斯科光明(代表著西方)與黑暗(代表著本土的吸血鬼)之神秘力量鬥爭,不同於蘇聯科幻小說意在彰顯蘇俄之偉大未來,而是將俄國未來寄望於接納西方現代文明。該作不但在俄國大獲成功,2004年被改編成電影,也深得西方讀者青睞。這絕非該作俄語多麼優美、故事設計多麼精巧,而是契合時代所需。蘇聯解體後,西方把俄國視為一個不再對歐洲和世界構成威脅的大國,積極支持俄國向市場經濟和民主國家轉型,大量外資、企業和技術進入俄國,歐盟和北約獲得俄國認可後東擴,歐洲在更趨安全的環境中為歐俄務實合作開闢更多領域。這些惠及俄國經濟,使俄國有史以來第一次不需要把大量資源用於軍備、國防、軍援,就能免受外部威脅或為全球爭霸所累。此外,大西洋兩岸許多大學斯拉夫學崗位向俄國文化精英開放,不是基於否定俄聯邦的政治動機,而是由於西方—俄國人文合作交流和斯拉夫學專業發展所需。因此普京時代雖希冀通過復興“俄羅斯世界”而調整振興國家戰略,但未妨礙社會對西方向往,俄聯邦仍是歐洲委員會成員,文壇和西方合作交流頻繁

(直到烏克蘭戰爭之後才終止)。這種情勢使盧基揚年科創作持續受到歡迎,《守夜人》系列先後被拍攝成電影,獲俄羅斯幻想類作品獎(2001~2004)、獎勵優秀科幻小說的銅蝸牛獎(2000~2006、2008、2010)、十多次獲旨在推動俄羅斯科幻小說發展的“羅斯康”獎(РосКон)。

另一位科幻小說家格盧霍夫斯基(Дмитрий Глуховский)之反烏托邦小說《地鐵 2033》(2002 年完成),從反方向表達俄國若脫離西方的後果:敘述核戰爭後幸存者,在封閉的莫斯科地鐵站生活的奇異情形,因他們不和西方接觸,會發生多方面變異。這樣的作品未得到出版社接納,但在網絡上廣受歡迎,很快 Эксмо(2005)、АСТ(2009)等出版社再版,獲新苗獎(2007)、被翻譯成 37 種語言且發行量達及百萬之巨,進而激起作者繼續創作《地鐵 2034》(2009)、《地鐵 2035》(2015)和《未來》(2009),繼續敘述脫離西方的俄國可能面臨的問題。

然而,科幻小說之成功,只是文壇顯示出的俄國如何面對西方的一個層面。隨著長普京時代延伸,越來越把西方重新塑造為敵人,這種敘事對文壇的影響是複雜的。索羅金《禁衛軍一日》(2006)呈現俄國自我封閉於西方、重蹈覆轍地把歐洲視為“腐朽的西方”之後果。烏利茨卡雅《東正教堂綠色頂蓋》(2010)以新聞小說和歷史研究相融合的方式,敘述三位出生在莫斯科的底層人,從斯大林葬禮到 1996 年布羅茨基去世期間,作為持不同政見者在蘇聯生活、作為移民到西方後的複雜人生,呈現國家對西方的不同立場,普通人的生活際遇大相逕庭。先後獲布克獎(2002)和索爾仁尼琴獎(2012)的帕弗洛夫(Олег Павлов)《馬丘辛的事業》(2013),觸及蘇聯如何以為“已趕上並幾乎超過美國”神話。佩列文《倒轉的聖書》(2015)敘述主人公把自己在西方經歷定義為“可耻、臭名昭著的”之荒謬。造成如此反差,乃長普京時代改變後蘇聯進程的結果。入歐之途困難重重,乃因當局終止去蘇聯化進程,把以懷疑西方和不信任自由市場經濟為主體的蘇聯,改造為懷舊的青春歲月 and 兒童時光等,引導國民強化俄聯邦和西方之不同、恢復帝國的積極意義等。^⑥如此一來,大西洋兩岸由俄聯邦希望融入其中的區域,再度演化為作為“敵人”的“西方”。這種逆轉引發索羅金創作反烏托邦小說《禁衛軍一日》,前瞻性地敘述未來俄國(2028 年)恢復沙俄特殊時期(1565~1572)的恐怖情形,即俄國人被自己修築的俄羅斯長城與世隔絕開來,過著與西方為敵的內耗生活;也激起貝科夫《島嶼,又名巫師學徒》(2010)重叙 1925~1926 年間列寧格勒處罰那些被視為和共濟會有關人士案件,以發掘俄國反西方的傳統。

如是情勢,自然衝擊到文學獎。眾所周知,普希金作為俄羅斯民族詩人,在俄國享有至高無上地位,1881 年俄羅斯科學院就設立普希金獎,蘇聯終止該獎項。1989 年阿爾弗雷德·捷普菲爾基金會設立該公司冠名的“普希金獎”,以其高額獎金和評審結果的公正性而享有廣泛聲譽。彼托夫(1990)、彼得魯舍夫斯卡婭(1991)、伊斯康德爾和沃爾科夫(1992)、普里戈夫和基彼洛夫(1993)、利普金(1995)、日古林(1996)、阿斯塔菲耶夫(1997)、馬卡寧(1998)、楚洪采夫和庫什涅爾(1999)、馬姆列夫(2000)、列伊因(2003)等最具實力文學家先後獲獎。然而該獎 2005 年落幕,原因複雜,但與它不是俄國人所設不無關係。

面對融入西方之艱困,普京調整國家發展戰略初見成效,俄國作家聯盟和阿爾法銀行等合作,於 2000 年設立“俄國卓越文學獎”(Большая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премия России),旨在獎勵那些以忠於俄國文學傳統為導向的詩歌、小說、戲劇和文學研究。自 2005 年起,增設“為了俄國利益”特別獎。作協理事會批准的評委會討論決定最後的優勝者,評審範圍包括面向全俄作者和地方作者(專門針對薩哈—雅庫特地區)。首屆獲獎者為科學院通訊院士斯卡托夫(Николай Скатов)《普希金:俄羅斯天才》、《我們同時代人》主編昆亞耶夫(Станислав Куняев)《詩歌、命運、俄國》,雅庫特州功勳

作家和薩哈神學院副院長盧季諾夫(Николай Лугинов)《按成吉思汗命令》、後來支持普京發動烏克蘭戰爭的高爾基文學院副教授謝根(Александр Сегень)《使用過的》和《俄羅斯颶風》。該獎旨在獎勵來自全俄各地的作者積極創作助於建立統一的俄國身份認同之作,這種趨向自2004年更為強勁。《明日報》副主編和《文學日》主編邦達連科《俄羅斯愛國主義的三副面孔》獲此獎(2004),乃因它彰顯國家所需的話語導向;蘇聯—俄聯邦科學院通訊院士和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長庫茲涅佐夫(Феликс Кузнецов)《〈靜靜的頓河〉之真理》仍按蘇聯反映論方法闡釋,獲此獎(2005)。這種趨勢醞釀出該獎項自身危機,2013~2015年無法運行,2021年評審虎頭蛇尾,烏克蘭戰爭發生後該獎項本該得先機,更有作為,卻在當年終止了。

普京第二個任期到來不久,莫斯科人文大學、俄國語言文學愛好者協會等在2005年聯合創設布寧獎(Бунинская премия),旨在扶持祖國文學傳統,獲勝者得獎金55萬盧布,最終的四位候選人獲6萬盧布,人文大學校長伊利因斯基(Игорь Ильинский)任監事會主席,獲“國民藝術家”稱號的文學批評家和音樂批評家貝爾扎(Святослав Бэлза)長期任評委會主席。由此,彼托夫、希什金、彼得魯舍夫斯卡婭、普羅哈諾夫等著名作家,和格拉寧、普里列平、波廖科夫等追求主流話語的作家,獲獎或入圍短名單。克里米亞入俄和烏東戰事引發西方制裁,推動普京營造出反西方的社會氛圍,但董事會一如既往地繼續支持俄羅斯文學中的愛國主義傳統、關心俄語命運。^⑦這種反西方意願的導向卻反噬本獎自身,2018年董事會認為大多數參賽作品不符合要求,決定停止這年評選活動,解散評委會,殊不知該獎就這樣無疾而終。

在如此矛盾中,長普京時代改變著國家獎的導向、使國家獎走向日趨官方話語化,既終止葉利欽設立的一些重要獎項,又增設新的國立文學獎,如增設俄聯邦總統青年文化活動家獎、兒童少年文學藝術作品獎,還擴大國家獎在文學藝術領域名額。文學獎如此體制化,克里姆林宮顧問別爾科夫斯基(Станислав Белковский)在普京第二任伊始就已預言,“2004~2008年應當奠定滿足俄國所需的基礎。我們各民族有著共同命運—帝國命運”(《共青团真理報》,2004年1月19日)。

三、民間文學獎分化:長普京時代文壇大面積變化

如此情勢中,葉利欽時代設立的許多非官方文學獎之影響力不斷遞減,甚至消失。在德國基金設立的普希金獎終止時,朱可夫基金會同普希金博物館等於2006年及時創設“新普希金獎”(Новая Пушкинская премия)。獲獎者除別楚赫(2007)和波波夫(Валерий Попов)、庫爾巴托夫和羅德良斯卡婭(2010)等重要作家、批評家之外,還有鮑恰洛夫(2005)、歸僑詩人庫巴蘭諾夫斯基和阿列克謝·盧基揚諾夫(2006)、小說家諾維科夫(Дмитрий Новиков)、《十月》評論部主任普斯托娃雅(Валерия Пустовая)和詩人格爾波夫斯基(Глеб Горбовский)、文學史家和翻譯家米麗欽娜(Вера Мильчина)、作家阿布茲雅洛夫(Ильдар Абузяров)等,這些人身份各異,普遍懷有蘇聯情懷。然而,該獎雖迎合長普京時代國家話語,卻影響力不彰,維持十年後,無疾而終。

長普京時代使許多民間文學獎停止運營的同時,又鼓勵創立新的民間文學獎。在普京執政第一年(2000),巨富和國家杜馬代表斯科奇(Андрей Скоч)通過“世代”國際基金會設立“新苗獎”(Дебют),翌年又出現 ЭКСМО 出版社和《旗》雜誌合作創立獎勵年度優秀俄語中篇小說“伊凡·彼德羅維奇·別爾金獎”、作家和實業家圖彼林(Константин Тублин)與批評家托波洛夫在彼得堡合作創立名為“全國暢銷書獎”(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бестселлер)。詭異的是,迎合長普京時代所創設的獎項,多被時代反噬:國立莫斯科人文大學創立“布寧獎”,獎勵年度優秀文學作品,每年獲獎者

多達 5~6 人,也只存續 12 年。

在曾任葉利欽政府第一副總理的丘拜斯(Анатолий Чубайс)的倡議下,俄國能源股份公司提供財力支持,科學院通訊院士亞歷山大·拉甫羅夫(Александр Лавров)、莫斯科大學教授波戈莫洛夫(Николай Богомолов)等設立“全俄‘詩人’獎”(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ремия Поэт),庫舍涅爾、楚洪采夫、基彼洛夫、葉甫圖申科等健在時曾獲過獎。但 2018 年 5 月 22 日丘拜斯在頒獎典禮上宣稱,“13 年來‘詩人獎’不僅存在著,而且形成了詩人的‘最高聯盟’。但若我們要履行支持民族詩歌的使命,就必須改變。為了進一步發展創作活動,將設立一個新詩歌獎”,以取代這個獎項並在青年中推廣。^⑧“成就”基金會設立的“詩人獎”(2019),因太緊跟潮流,只維持三年就夭折。

同樣,歐亞研究院發展基金、葉利欽總統中心基金會、“俄羅斯世界”基金會聯合創立“俄羅斯獎”(Русская премия),先後覆蓋中亞和外高加索、原蘇聯、全球的俄僑所創作的俄羅斯文學,旨在召喚更多的人參與建構統一的國族認同。然而,2008 年 8 月因俄格戰爭及其嚴重後果,導致獨聯體參賽者減少,組委會竟然授予全球只有俄聯邦承認的“南奧塞梯共和國”之軍旅作家塔德塔耶夫(Т. Тадтаев)用俄語書寫的戰爭題材小說。作者參與奧賽梯從格魯吉亞分裂出來的戰爭,多次負傷,獲南奧賽梯“保衛祖國”勳章,這樣的作家居然常在《涅瓦》、《北方》、《獨立報》等俄國媒體上發表《叛教者》等作品。克里米亞入俄和頓巴斯戰事之後,更改變了後蘇聯地緣政治格局,獨聯體國家作者正面參賽作品銳減(反俄作品數量劇增),組委會卻順勢擴大烏克蘭作家得獎數量,如 2014、2015 年授予哈爾科夫大學副教授克拉斯樑希(Андрей Краснящи)《背叛與投敵》、小說家馬托科夫斯基(Максим Матковский)《鸚鵡在熊窩》、詩人葉芙薩(Ирина Евса)主編《荒原:20 世紀末烏克蘭—俄羅斯詩人作品選》等五位。該獎充分迎合長普京時代,但僅存續 12 年,令文壇唏噓不已。

在這些民間文學獎中,“新苗獎”特別引人注目。該獎意圖在組織青年俄語文學愛好者的文學競賽,從中選擇優秀的大/小篇幅小說、詩歌、戲劇這四種體裁作品;因文化部看到了該獎的影響力,2004 年增加文學批評獎,2005 年添列電影文學獎,2007 年增設幻想小說,2009 年增添優秀散文獎。每屆評委會主席皆為著名作家或批評家,包括卡巴科夫(2001)、波波夫(2005)、馬卡寧(2006)、基彼洛夫(2008)、巴克(2009)和羅佐夫斯基(2010)、巴辛斯基(2012、2104)等。由於該獎覆蓋各體裁、專業化評審機制、高額獎金(2013 年獎金為 100 萬盧布),很快吸引成千上萬的文學青年,當年參賽作品達 3 萬件,到 2005 年參選者達到 17 萬人次,稿源來自俄國各州作者以及原蘇聯空間國家和美國、以色列、澳大利亞、日本等地俄僑。獲首屆詩歌獎的是伊爾庫茨克師範大學女詩人博雅爾斯吉赫(Е.Боярских)《婦女之聲》、雅羅斯拉夫大學物理系學生尼特琴科(Андрей Нитченко)詩集《水表》獲文學精神探索獎、托木斯克文學青年布爾金(Станислав Буркин)《神奇的絞肉機》(2006)獲 2007 年大篇幅小說獎等。評委會給獲獎作品編輯成年度專輯,如《替換調色板》(2005)、《幸福的周邊》(2007),在文學青年中產生廣泛的影響,召喚青年人對俄羅斯文學的熱望,直接推出文壇新秀達 90 來名,培養出不少傑出作家。《十月》雜誌編輯普斯托娃雅(Валерия Пустовая)因《新生活宣言》(《新世界》2004 年)獲新苗獎(2006),很快成為重要批評家,先後獲《新世界》獎(2007)、新普希金獎(2008),升任《十月》批評欄目主任。

該獎契合時代所需,2003 年俄聯邦文化部受其啟發設立年度“世代之聲”特別獎,包括最佳兒童和青少年文學獎、提升年輕評論家在俄羅斯文學進程中作用的批評獎,放在“新苗獎”中一起評審。這樣一來,參加過第二次車臣戰爭的巴波欽科(Аркадий Бабченко)所寫的《戰爭十集》獲“文學勇氣獎”(2001),來自柏林的青年記者蓋伊斯特(Василий Гайст)《在被征服土地上的勝利者》

(叙述居住德國的原蘇聯衛國戰爭老兵的命運)獲此獎(2005),莫斯科中學女生捷列霍娃(Марьяна Терехова)以純情文字書寫戰勝疾病的《蝴蝶》獲“文學勇氣獎”(2007)。

然而,新苗獎在文學發展再度轉型時段運行,哪怕其評審機制能保證公正性,也無法應對社會複雜化的審美觀。面對評審結果並非公正意願的表達,詩刊《阿里翁》主編阿列欣(Алексей Алехин)的《金色乳頭》(2007)斥責道,這個獎把青年創作文學轉化為投機事業,許多獲獎者和入圍者都經不起批評,鮮有真正才華橫溢的作家經得住激勵的,他們獲獎後很快就墮落,“真正的人才不需要且也不利用‘青年’的特殊地位,因為幸運又美麗的女性通常對性別問題漠不關心。這裡所論的不幸,不在於作者年輕,而在於該獎尚未成為重大文學現象,雖然有人試圖真誠地說服自己和他入,此獎有望創造出新文學,且是傑出文學。罪責在於不負責任的那些成年人,他們助長這些青少年的急功近利”。^⑨克里米亞入俄,招致西方制裁、鄰居疏離,莫斯科和彼得堡等大批青年人移民/留學西方後發送的參選作品,普遍不符合重建“俄羅斯世界”潮流,造成2015年獲獎作品中,沒有選出合適的戲劇類和幻想獲獎類作品,其他文體的獲獎作品,也備受爭議。就是這樣令人黯然的評審結果,也成為該獎最後的挽歌:2022年作協委托潘克拉托夫(Георгий Панкратов)這位兩度入圍“巨著獎”名單的文壇新秀推出《新苗獎:怎麼沒有成為作家》,紀念該獎的最後餘暉。文學獎的這種教訓,使曾獲獎的許多年輕新秀放棄文學事業。

令人驚訝的是,面對“俄國卓越文學獎”前四年風生水起,“支持祖國語言文學中心”和俄國文化部、俄羅斯科學院、圖書聯盟等在2005年聯合創設“巨著獎”(Большая книга),旨在獎勵有著深刻道德—心理意識的俄羅斯傳統的小說、傳記。它由專業文學家、出版商、文化藝術活動家等百名人士組成專家團,推薦並確定8~15部作品名單,對每一部作品都形成專家委員會意見;在此基礎上,蘇聯時代名作家格拉寧和拉津斯基、後現代主義作家馬卡寧和彼托夫等先後任評委會主席,評委會最終從中評出一、二、三個等級獎各一名,獎金分別為1.5、1、0.5萬美元。首屆獲一、二、三等獎的,分別是貝科夫《帕斯捷爾納克》、卡巴科夫長篇小說《一切皆可矯正》、希什金長篇小說《維納斯的頭髮》,理由是各自挖掘俄羅斯精神價值。

2014年之後局勢進一步大變,許多文學獎無法適應或不願意適應而消失,但“巨著獎”一如既往:文壇新秀雅辛娜(Гузель Яхина)《祖列哈睜開眼》獲“巨著獎”(一等獎),它重新叙述1930年集體化傷及穆斯林的沉重歷史。如此深刻叙述,卻被《文學報》評論員阿爾塔莫諾夫(Владимир Артамонов)指責,“這部反蘇作品在一個自稱是全國性獎中獲勝,鮮明地說明,今天正式刊行的紙質文學作品越來越遠離有思想的讀者,文學已然成為一種政策工具或一種盈利方式”;^⑩波廖科夫認為這部流行小說中的基本元素和獲獎所需相結合,就成了所謂愛國作品(отчизниство),“在獲布克獎、雅斯納亞·波良納獎、巨著獎的作者中,有的人響應消除蘇聯遺產之影響的設獎目的。這個新奧林波斯獎挑選候選人,是基於其反蘇,甚至恐俄症,最終滿足社會冷漠無情所需。這樣的獲獎作品,一兩年內就會被人遺忘”。^⑪實際上,雅辛娜是與時俱進的新生代作家,其《我的孩子們》再獲巨著獎(2019),尤其是獲俄聯邦國家文學藝術獎(2019)。

巨著獎的這種導向,使得因《恰金》而獲此獎的作家沃德拉茲金(Евгений Водолазкин),作為科學院“普希金之家”古羅斯文學博士,一直致力於發掘古羅斯文化史,甚至創作出寫古羅斯東正教價值的《月桂樹》(2012),並由此先後任總統文化藝術委員會、國家杜馬文化委員會委員。更有甚者,參加過車臣戰爭的作家普里列平(Евгений Прилепин),其《肖洛霍夫:非法的》獲巨著獎中的讀者獎。2014年之後他公開支持當局的烏克蘭政策,讚賞普京對烏克蘭展開特別軍事行動,2023

年1月前往戰區，獲任某部副指揮官和中校軍銜。評委會主席自2012年一直由人文大學教授和國家文學博物館長巴克(Дмитрий Бак)擔任，他在2014年文化活動家支持普京收復克里米亞的公開信上簽名，2022年以來切實支持對烏克蘭戰爭，2024年開始任總統文化藝術委員會委員。這種積極投身於長普京時代的社會名流擔任評委會主席，促成該獎急劇地國家話語化，如俄聯邦總統文化藝術委員會委員(2011~2024)瓦爾拉莫夫(Алексей Варламов)、獲俄聯邦國家獎(1993)和支持普京對克里米亞政策的歸僑作家舍米亞金(Михаил Шемякин)、普里列平分別獲一、二、三等獎，獎金分別為300、150、100萬盧布。巨著獎的這種導向乃文壇的常態，2024年各大文學獎皆然。

四、文學功能何在：長普京時代延伸伴隨著文學獎紛爭

隨著長普京時代延伸，在日常生活中蘇聯痕迹不是減少，而是日漸凸顯，這與在文學藝術領域不斷復活蘇聯傳統近乎同步，如引導企事業單位設立文學獎，使文學變成國家話語之美學表達，看上去更自然。然而，《大眾傳媒法》保障審美自由，這就使國家話語化的文學獎引發的紛爭不斷。

如是趨勢激發實業家和出版商圖波林(Константин Тублин)、批評家托波洛夫2001年在彼得堡設立全國性年度最佳俄語小說獎(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бестселлер)。入首屆最終角逐者名單的是入圍布克獎(2000)的波爾馬特(Сергей Болмат)之《自食其力》、貝科夫《宣告無罪》、政客和作家利蒙諾夫《死亡之書》、普羅哈諾夫《夜行》、索羅金《湯》、偵探小說家尤澤弗韋奇(Леонид Юзефович)《風公爵》等；第二屆最後角逐作品包括普羅哈諾夫《黑炸藥先生》、帕弗洛夫《卡拉干達第九日》、斯拉夫尼科娃《不朽》等；2003年入圍決賽作品包括貝科夫《正字法》等……這顯示該獎一開始就是獎勵名人的。這在2004年之後更成為常態，克里米亞入俄後，被國家話語主導的趨勢有增無減，如以下作品曾獲該獎：彼得堡《文化時代》雜誌主編莫斯科文娜(Татьяна Москвина)懷念蘇聯的《蘇維埃少女的人生》(2015)，托波洛娃(Аглая Топорова)否定性敘述基輔獨立廣場革命之作《烏克蘭的三次革命》(2016)，傳記作家盧班諾夫(Андрей Рубанов)敘述頓巴斯戰事背景下愛國者在莫斯科行動的《愛國者》(2017)，以及在德國俄語電台工作的彼得洛夫斯基(Дмитрий Петровский)《親愛的，我回家了》(2018)等。這種直接體現“俄羅斯世界”概念的評獎導向，是長普京時代的普遍狀況，如《愛國者》獲雅斯納亞·波良納獎(2017)、廖波夫小說集《法西斯分子》(2021)入圍卓越文學獎短名單(2024)。2022年組委會公佈入圍名單後宣佈不頒獎，翌年初組委會解釋這一決定是暫時的，但最終沒有下文，至今沒有恢復。

同樣，Эксмо出版社和《旗》雜誌在這樣的情勢中，接受批評家伊凡諾娃倡議，2001年創設以文學人物形象命名的“伊凡·彼得洛維奇·別爾金獎”(Премия Ивана Петровича Белкина)，旨在獎勵年度優秀俄語中篇小說。該獎的生機僅維持五年，隨著時代氛圍變化和作家對文學認知之巨變而改變。2009年獲獎者乃出生並生活在烏克蘭的加繆恩(Ульяна Гамаюн)《穿著舊鞋的無聲生命》，她卻拒絕該獎。批評家瓦西連科比較別爾金獎和布克獎說，布克獎是在大英帝國崩潰背景下產生的，旨在保護英國文學影響力，布克獎之於俄羅斯文學是外來的(чужероден)，而別爾金小說獎則最具俄羅斯特色，只獎勵發自俄國人內心的作品，因此該獎會成為社會討論的中心。¹²不幸的是，這種原本要通過文學建構俄羅斯國族認同的目標，卻因被國家話語裹挾，2013年落下帷幕。

2003年，在列夫·托爾斯泰誕辰175年之際，國立列夫·托爾斯泰博物館和三星電子公司聯合創立雅斯納亞·波良納獎，旨在獎勵體現人類理想的當代作家優秀作品和俄譯外國作品。該獎評選傑出的俄羅斯文學藝術作品(2003~2005)，後被代之以“當代經典”獎和“21世紀”獎(2006~

2011)。首屆獲“當代經典”獎(2006)的是曾獲蘇聯國家獎(1981)和俄聯邦國家獎(2004)的別洛夫(Василий Белов)之小說《凡人瑣事》(1966),引發讀者懷舊性閱讀蘇聯時代文學經典。2012年開始增加“幼年、少年、青年”獎,獲首屆該獎的是布克獎、巨著獎得主德米特里耶夫(Андрей Дмитриев)《農民和半大小子》(2012)。從2015年開始又增加“外國文學獎”和“讀者獎”,是年獲“當代經典”獎的是曾獲國家獎(1992、1997)的彼托夫(Андрей Битов)的《亞美尼亞課程》(1969),該作前瞻性敘述蘇聯民族問題。獲“21世紀”獎是雅辛娜的《祖列哈睜開眼》,獲其中“幼年、少年、青年”獎的是貝林斯基(Валерий Былинский)處女作《暗礁》(1995),獲外國文學獎的是美、加作家露絲·奧澤吉(Ruth Ozeki)《我的魚會活下來》。2022年“當代經典”獎授予丹尼洛夫(Дмитрий Данилов)《薩沙,你好!》,外國文學獎授予余華《兄弟》。評委會試圖既滿足國家話語所需,又能兼顧文學審美質量,引發拉斯普京、彼托夫、邦達列夫、馬卡寧等拒絕接受提名“當代經典”獎,並指出可公正地稱為當代經典的作品眼下尚未出現,致使該獎在急需通過文學獎促進國家認同的烏克蘭戰爭之際黯然終結。

2009年,正值果戈理誕辰二百週年之際,普羅哈諾夫基金會創設獎勵優秀俄語小說的“新語言文學”獎(Новая словесность),利波維茨基等著名批評家出任過評委會主席,別列文的長篇小說《t》和《給漂亮女士的鳳梨水》、索羅金《暴風雪》、希什金《寫作指南》、魯賓斯坦《關切的表現》等獲獎(或進入最後的短名單)。這種以文學審美質量為導向的評審,未因克里米亞入俄所引發的國族主義浪潮而改變,招致紛爭不斷,即讀者和官方話語之間的分裂日趨嚴重,2022年不幸終結。

最嚴重的文學獎事件,當屬布克獎終結。伴隨俄聯邦誕生而創設的布克獎,一路走來就紛紛擾擾。如該獎設立四年後,《獨立報》創立獎金比其多一美元的“反布克獎”,而別列文的名作《恰巴耶夫與虛空》未能入圍布克獎,引發軒然大波。就是在激烈的紛爭中,布克獎一年一度推出力作。以《伏爾泰的男女信徒們》(2004)獲布克獎的回歸作家阿克肖諾夫就注意到,“布克獎是另一個層面的文學氛圍。我確信,有人推薦我的作品角逐該獎,它也就得獎了,哪怕作品沒拍成電影電視。電視劇和獲獎不會構成衝突,因為是不同領域、層面,有不同的思想維度、理解高度”。^⑬隨著俄聯邦進程,社會氛圍變化,2005~2017年間該獎雖如常評審、頒獎,古茨科《無路尋踪》(2005)、斯拉夫尼科娃《2017》(2006)……阿列什科夫斯基《城堡》(2016)等先後獲獎,但質疑布克獎的聲量也不斷升高。在貝科夫《布克獎是如何選擇的?最糟糕的是……》(2010)看來,“布克獎評審團有驚人的能力,可以從短名單的六部小說中選出最糟糕的,或至少是最不重要的那部”,“俄羅斯布克獎鼓勵的,不僅是寫作狂熱者,而且是一種集極不諷刺幽默、很無聊、多層次庸俗之大成,我們須相信,這是俄羅斯文學之縮影”。^⑭更有甚者,批評家特盧寧(Константин Трунин)聲稱,“自設立以來,布克獎一直就未能證明自己的合法性,每年都會選出一位優勝作家,其作品與俄國人對現實的理解相去甚遠。這不是對俄羅斯價值觀的直接宣傳,而是對西方價值觀的張揚。西方推薦的文學,並不註定作家要創作與貫穿19世紀俄國傳統相似的作品。年復一年,俄國布克獎在新興獎項中失去信譽也就不足為奇了。在第26屆評獎後,它面臨著贊助商的斷供,因此有必要重新審視其存在的意義,以滿足向真正的俄羅斯人文主義價值體系的轉變”。^⑮也就是說,隨著國家話語轉向,曾給文學注入生命活力的布克獎,影響力日減、紛爭卻不斷增加,2019年9月被宣佈終止,標誌着一個時代結束。

伴隨著長普京時代延伸,文學獎日趨體制化,因而那些積極投身於社會主流話語的文化藝術界名流更容易獲獎。第7、8屆杜馬文化委員會議員沙爾古諾夫(Сергей Шаргунов),係作家和出版社聯盟主席,2012~2016年作為俄羅斯語言藝術和愛國文化協會成員,任《自由進步》網絡主編,先

後獲巨著獎(2017)、聯邦政府獎(2018)等。國家獎也發生相應的轉向,如讚賞普京長期執政的俄國藝術學院院長和長期任布寧獎評委會主席貝爾扎獲國家獎(2012)和政府獎(2013)。

在這樣的情勢中,歷史悠久的安德烈·別雷獎(1978年列寧格勒地下雜誌《時鐘》設立的非官方文學獎),卻始終保持著文壇聲望。最初旨在獎勵詩歌、小說和人文學術研究,1997年增加為文學服務貢獻獎,從2009年開始增加文學批評獎和翻譯獎。2017年獲獎詩人是畢業於莫大化學系的利沃夫斯基(Станислав Львовский)、獲獎小說家是別列文、獲學術成就獎的是俄國文化學院心理分析教授魯德涅夫(Вадим Руднев)、獲為文學服務獎是長期擔任該獎評委和巨著獎評委的莫列夫(Глеб Морев)。該獎完全是榮譽性的,獎金只有一盧布、一瓶伏特加、一盤蘋果,“對語言藝術之極限的探索,對新語言的金礦脈的辛勞開採,沒有豐厚的報酬,也沒有榮耀。也因沒有巨大的經濟利益,歷史累積了那些獲該獎之作的聲望,更尊重安德烈·別雷獎,它邀請我們去看看新語言的黃金是如何在這些文本中尋找到的”。^⑩

長普京時代改變了文學發展方向和文壇結構,官方文學獎和此前迥異。1990年代國家文學獎幾乎都來自蘇聯時代普通作家,其中獲1994年度俄聯邦國家獎的詩人列維坦斯基(Юрий Левитанский),原本是以書寫蘇聯普通人情感為主體的普通詩人之一,早期曾寫過《士兵之歌》(1948)、《遇見莫斯科》(1949)、《我們的時光》(1952)等得到大眾青睞、官方不反對的作品,因詩歌《在新年棕樹旁的對話》(《旗》1970年第1期)被譜成電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淚》(1980)的主題曲而廣為人知。這種遠離蘇聯官方意識形態卻能得到受眾普遍接受的詩人獲獎,顯示出俄聯邦試圖拉開和蘇聯制度的審美傾向。這次獲獎,促使詩人更注重詩歌創作的日常生活性,如詩篇《每個人自主選擇》被作曲家別爾科夫斯基(Виктор Берковский)、功勳藝術家(1988)和國民藝術家(2001)別列津(Сергей Березин)譜成曲,用作因沙科夫(А. Иншаков)據司各特小說《巴黎的羅伯特伯爵》拍攝的同名影片(2000)的主題曲。

相較於此,通過審美質量而提升公眾素質的文學效益在長普京時代日益遞減,國家文學獎也受到衝擊:一方面2008、2010~2012、2014~2017年沒授予任何作家和詩人,即便正值烏克蘭衝突期間特別需要文學強化俄聯邦國家認同,2022、2023年文藝領域獎勵立竿見影的影視、舞蹈名流,文學家不在其列;另一方面獎勵體制化名流,曾獲文化部獎(2014)、國家獎(2019)的庫爾巴托夫是總統文化委員會委員,2014年他公開支持收復克里米亞,而2020年獲國家獎的是俄羅斯正教會對外聯絡部長阿爾菲耶夫(Г. Алфеев)、獲國民藝術家(1995)稱號的雕塑家盧卡韋什尼科夫(А. Рукавишников)、謳歌普京戰略的女歌手戈爾茲姆娃(Хибла Герзмава)。

文學獎趨於國家話語之勢,是長普京時代文壇的典型症候。先於蘇聯解體之前就分裂了的作協,很快就成為自負盈虧的民間團體,日益缺乏向心力和聲望,但隨著國家話語滲透文壇,作協也再度體制化。2025年2月末,作協第17次特別代表大會通過了以“俄國作家協會”為基礎整合專業文學工作者的大會宣言,總統助理和原文化部長梅津斯基(Владимир Мединский)高票當選作協主席兼秘書長。這位在烏克蘭戰爭發生不久就作為俄烏談判代表團成員的主席,在就職演說中強調作協須重樹權威、更新與整合,此乃國家層面的重要任務。相應地,這也使統一的俄羅斯文學進程困難重重,如《旗》常務副主編伊凡諾娃《作為外國代理機構的俄羅斯文學》(2013)所說,僑民作家參與祖國文壇,已然變成敏感現象。^⑪

總之,文學獎曾是葉利欽時代推動文學積極參與社會進程的重要力量,讓世人從中看到了國家去蘇聯化的強勁趨勢,但隨著長普京時代延伸,社會氛圍日趨復興“俄羅斯世界”,哪怕沒有書報刊

審查制度威脅、有《大眾傳媒法》保障，文學仍被這種氛圍所滲透，以至於那些不顧及這種時代變化，或不以懷舊性心態敘述蘇聯歷史，或仍希望融入西方的作家，很難獲官方獎。這種變化波及最具聲望的女性主義作家彼得魯舍夫斯卡婭，此後只獲得民間文學獎而不可能獲俄聯邦政府獎。後現代主義文學在俄聯邦最初十多年是文壇上最有實績的，包括回歸的另類文學、索羅金的觀念主義文學、別列文的玄幻文學、阿庫寧的偵探小說等各種形態，^⑩但這種豐富多彩情景此後逐漸消失。由於沒有完成世代更替，這些人仍是文壇主體，但思想力度和審美視野遠不及前。更有甚者，文學獎曾以批判性姿態介入國家走向，如多個文學獎授予否定性敘述車臣戰爭的作家，但長普京時代文學獎對俄格戰爭、克里米亞入俄和烏東戰事、烏克蘭戰爭或置若罔聞，或獎勵那些正面敘述這些題材的作家作品，以推動更多作家投身於愛國主義。這種變化，在相當程度上是克里姆林宮直接推動的，如 2024 年 12 月總理米舒斯金簽署總理令，設立俄聯邦少年兒童文學藝術獎，鼓勵作者、插圖畫家、出版商為俄聯邦少年兒童文學藝術事業做貢獻，提高俄國少年兒童文學的社會意義，以高額獎金鼓勵創作出這方面題材作品的最佳小說家、詩人和出版商等七名。2024 年能運行的民間文學獎幾乎都是 21 世紀新設立的，即葉利欽時代所創設的民間文學獎大多消失了。

①Вернется ли Россия в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俄國是否要回到蘇聯?)// Московская правда, 29-01-2007.

②弗拉基米爾·戈爾曼：《中央—地區—地方自治：當代俄國的中央再集權政策》，上海：《俄羅斯研究》，2009 年第 4 期。

③ О. Рашидов, Писатель - патриот Александр Проханов: Хочу бросить в котел борьбы с режимом и скинхедов, и лимоновцев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24 апреля 2002.

④全俄國家電視廣播公司俄羅斯 24 台 (Россия-24) 電視節目，2007 年 7 月 12 日。

⑤Марк Амусин, Чем сердце успокоится: заметки о серьезной и массов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в России на рубеже веков //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 3, 2009, С.13.

⑥Andrew Kahn, Mark Lipovetsky, Irina Reyfman, and Stephanie Sandler, A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702.

⑦ Ильинский Игорь, Хватит шуметь, господа! //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10 августа 2015.

⑧Премия Поэт сменит премия Поэзия // Colta, 22-05-2018.

⑨Алексей Алёхин, Золотая соска// Арион, № 3, 2007.

⑩Артамонов Владимир. Гузель показала личико //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17 декабря 2015.

⑪ Юрий Поляков, что стоит за литературными премиями. // Москва.Центр. 10 декабря 2015.

⑫Светлана Василенко. Критика критики, или опять о премии Белкина //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Россия. 23 -02-2010.

⑬Василий Аксенов, `Я возвращаюсь в Россию` // Виперсон, 06 декабря 2004.

⑭Д. Быков, Как выбирает Букер? Да как все: худшее... // Новая газета, № 137, 6 декабря 2010 г.

⑮К. Трунин, Лауреаты российских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премий, 2018.

⑯Вадим Левентал, Шум машины письма //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 № 232 от 10.12.2007.

⑰Наталья Иванова,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ак иностранный агент // Знамя, номер 6, 2013.

⑱А. М. Кусаинова,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останай: Костанайский филиал ФГБОУ ВО Челябин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20.С.51.

作者簡介：林精華，首都師範大學燕京學者、安徽大學至誠講席教授、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北京市教委特聘教授。北京 100048

[責任編輯 桑海]